

1932—1942

萧红 十年集

(上)

林贤治 编注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萧红十年集(上、下)/林贤治编注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
2009

ISBN 978-7-02-006769-5

I. 萧… II. 林… III. 文学-作品综合集-中国-现代
IV. I216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89519 号

责任编辑:刘稚

装帧设计:康健

责任校对:常虹 朱美凤 陈莎 责任印制:李博

萧红十年集(上、下)

林贤治 编注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北京北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993 千字 开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 35.25 插页 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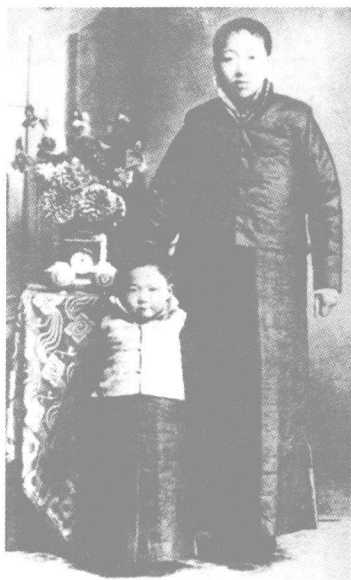
2009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5000

ISBN 978-7-02-006769-5

定价 60.00 元(共两册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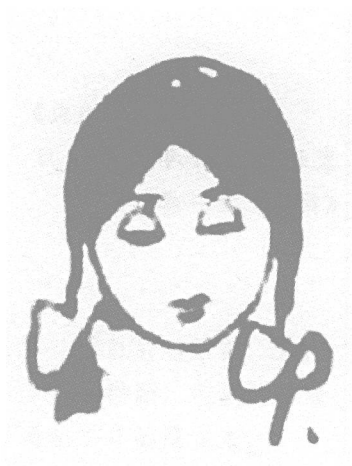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

萧红与母亲姜玉兰合影



少年萧红



冯咏秋笔下的萧红漫画像



萧红像



左起：梁山丁、罗烽、萧军、萧红1933年摄于哈尔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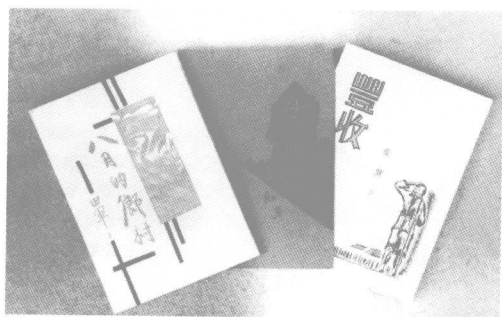


萧红与萧军在哈尔滨



1934年，萧红与萧军在哈尔滨

1935 年起相继出版的“奴隶丛书”：叶紫《丰收》、萧军《八月的乡村》、萧红《生死场》



1935年，萧红摄于鲁迅家门前的台阶



1934年底，萧红与萧军如约去赴鲁迅的宴请



萧红与萧军



萧红1936年摄于日本



1936年7月16日，黄源为去日本的萧红饯行，萧军同往，宴会三人上海万氏照相馆合影。左起为黄源、萧军、萧红

编辑说明

一、萧红的文学创作,从正式发表作品时算起,当始于1931年而终于1942年,为期十年,故文集名为《萧红十年集》。

二、本书按萧红十年间不同的创作阶段划界,共分四辑:第一辑为早期,即哈尔滨—青岛时期(1932—1934);第二辑为中期,即上海—东京—北平—上海时期(1934—1937);第三四辑为后期,即武汉—西安—重庆—香港时期(1938—1942)。作品按写作及发表先后顺序排列,个别有调整。

三、本书除萧红早期个别习作,后期个别仓促成章而作者本人生前也不曾收入文集者,以及剧本《突击》(合作)和《民族魂》外,其余作品全数收入。体裁包括小说、散文、诗和书信等。

四、每篇首面均附题解,概括内容大意、相关思想及艺术手法等。个别人名、地名及其他名词,则加脚注。

五、除前言外,书末附录年表,以便利读者对萧红及其作品的全貌有一个大致的了解。

在编辑、注释、校勘方面,本书仍当有不少错误,敬希读者及专家指出,以期再版时订正。

前言：萧红和她的弱势文学

今年，是萧红辞世第六十五个年头。

萧红的名字为人们所熟知，很大的原因，盖在于作为一个女作家的不幸的婚姻和早逝，她死去的时候才三十一岁。对于她的著作，人们不见得怀有更大的关注的兴趣，这是很可悲哀的。至于文学实绩，在文学史上也得不到相应的恰当的评价；文艺思潮兴替无常，或左或右，显然损毁、淹没了许多东西。

继鲁迅之后，萧红是现代中国的一位伟大的平民作家。说她伟大，是因为她在短暂的一生中，始终体现了对穷人和妇女等弱势群体的灵魂的皈依。她的善的爱、悲悯与同情是广大的，而且，这与她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专制性，以及社会不公的批判联系在一起，显示着一种人性的深度。当她以书写的方式表达着所有这些的时候，无视任何范式，而创造出了极具个人特质的自由的风格。在她的一百余万字的文学遗产中，至少有两部诗性悲剧《生死场》和《呼兰河传》，一部讽刺喜剧《马伯乐》，堪称经典之作。

婚恋史：生为女人

1911年，萧红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的一个地主家庭。父亲专制而保守，在萧红初中毕业以前就为她订了婚，毕业后不再让她上学。这样，她接受教育及自由婚姻的权利过早地被剥夺了。周遭房客的女人、农妇，和她们的女儿，以不断重复着的险恶的命运呈示给她。她感到恐怖。

上个世纪三十年代，五四的大潮已落，而流风仍在。这时，萧

红已经是一个读过易卜生的《娜拉》和鲁迅的《伤逝》的青年了。为了求得新知和爱情,她决然离家出走,远赴北平。正如鲁迅在题作《娜拉走后怎样》讲演中说的:“梦是好的,否则,钱是要紧的。”由于家庭断绝经济来源,半年之后,她被迫返回老家,遭到软禁;不久,又逃了出来,流浪在哈尔滨街头。最后,在打熬不下去时,她只好找未婚夫王恩甲,开始有条件的同居。

很快,萧红发现受骗,于是再往北平,试图寻找一种独立的生活。王恩甲追踪而至,结果返回哈尔滨的一家旅馆,实际上成了“人质”。在她怀孕数月的时候,王恩甲弃她而去,所欠旅馆的巨额费用全部押在她的身上。旅馆发出警告,如果她无力偿还,将有被卖做妓女的危险。

萧红在绝望之际,写信向《国际协报》求援。这时,作为报社的一名业余编辑的萧军出现了。两人迅即坠入爱河。稍后,萧红趁哈尔滨发大水的机会逃了出去,与萧军结合。在萧军的帮助下,萧红在医院里产下一个女婴,贫困中被迫送人;正是这“弃儿”,成为她,一位无力抚养孩子的年轻母亲的永久的伤痛。此后,他们一面维持生计,一面开始写作,在朋友的资助下,出版了两个人的作品合集《跋涉》,但是随即遭到查禁。

当时,整个东北已经沦为日本侵略军的占领区。他们不愿做亡国奴,于1934年6月逃离“满洲国”,南下青岛,继迁上海,过起动荡的流亡生活。

在上海,他们找到鲁迅。正如萧红说的,“只有他才安慰着两个漂泊的灵魂”。通过鲁迅,他们的文稿陆续得到发表,在十里洋场很快站稳了脚跟。

就在他们冉冉上升为两颗闪耀的文坛新星的时候,家庭共同体出现了可怕的裂痕。

对于萧军,萧红是爱的,感激的,但也有着明显的不满。主要是因为萧军一直以强大者和保护者自居,对萧红缺乏必要的尊重,时有发生戏谑与讥嘲,也是脆弱的萧红所不能忍受的;尤其是家庭暴力,譬如为作家靳以和梅志所见证的脸部外伤,所给予萧红的屈辱和损害是深重的。萧军的婚外恋,使萧红自觉被抛弃,加剧了

内心的创痛；为此，她曾经一度远走东京；回国后，第三次流寓北平。1937年，抗日战争爆发。生活所加于萧红的痛楚，虽然一时为抗日的热情所遮蔽，而伤口仍然因了某种契机而暴露出来。1938年春，在西安，她终于与萧军在平静中艰难分手了。

继而相恋同居的，是东北作家端木蕻良。这种关系，萧红一直维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。

然而，有阳光的日子毕竟短暂。命运再一次戏弄萧红。当时，她已经怀上了萧军的孩子，当她由武汉至重庆，直至产下这男婴，端木蕻良都不曾陪伴在她的旁侧。她孤独，失望，无助，出院时对白朗说：“未来的远景已经摆在我的面前了，我将孤寂忧郁以终身！”

在骆宾基根据萧红生前所述写成的《萧红小传》中，写到端木蕻良对萧红的两次“遗弃”：一次在武汉，他拿到一张船票以后，抢先撤退至重庆，留下萧红一个人耽在原地，不但行动不便，在经济上也得靠朋友接济。还有一次，是在太平洋战争期间的香港，萧红病重住院，他不告而别，一共长达十八天，把照顾病人的责任完全推卸到一个认识未久的朋友骆宾基身上。据萧红的朋友孙陵提供的材料，萧红最后曾用铅笔在纸条上写下“我恨端木”几个字。在香港，萧红曾经计划摆脱端木蕻良，但却迁延着没有实行。其中，一是如她所说，为女性惯于做“牺牲”的惰性所致；再就是身体过于虚弱，一切潜在的病症都暴露出来了。她一时拿不出力量拯救自己。当时，她还抱有一个幻想，就是端木蕻良曾经许诺让她到北平他的三哥家里去养病。在长期的漂泊生涯中，她一直渴望健康和一个安静的写作环境。然而，未及等到最后，美梦就幻灭了。

自由和爱情都是萧红所追求的。结果，她死在追求的道路上。她一生所承受的不幸、屈辱和痛苦，至少有一半来自她的“爱人”。而且，他们都是追赶新文化运动大潮过来的人！

萧红如何面对自己的命运呢？

她这样说：“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，都是因为我是一个女人。”

生活史：贫困体验

出于叛逆和反抗，萧红由一个地主的女儿沦落为流浪者、穷人，这构成她命运的全部，包括文学的命运。

在中国现代作家中，没有一个人像萧红这样被饥饿、寒冷、疾病逼到无可退避的死角而孤立无援。一个人，尤其是一个女性，要具有怎样的自由意志，方可以抵御这一切！

萧红的穷困生活，有过两个严重的阶段：最先是一个人流浪在哈尔滨街头，稍后是同萧军一起生活于南市街。萧红的自叙性散文《南市街》，忠实地记录了后一阶段的生活和个人的感受。美国学者葛浩文认为，本书可以同英国作家奥威尔的《巴黎伦敦落魄记》相比拟。奥威尔在书中描写的流浪生活，比如饥饿、典当、失去工作的恐慌与无聊，等等，许多情形与萧红的遭遇是相似的。

萧红在散文中，留下了只身流浪时饥寒交迫、呼告无门的片断情景，她饿着肚子，穿着单薄的衣服，通孔的凉鞋，无目的地行走在冰雪的大街上。铜板一天天减少，在寒夜里，差点连喝一杯热浆汁的钱也凑不够。她曾经找过亲戚，大门紧锁；去找熟人，熟人早已迁移。在深冬的夜里，她感到身上的力量完全用尽了，双脚冻得麻木，昏沉中，被一个做皮肉生意的老太婆领到家里过夜。当她在狭窄而阴暗的屋里醒来，发现套鞋被偷了；离开前，老太婆又要她留下一件衣服典当，充做她的住宿费。她像做了噩梦一般，从身上退下单衫就走了。

她这样写下自己流浪街头的感受：“当我经过那些平日认为可怜的下等妓馆的门前时，我觉得她们比我幸福。”

萧红一无所有，即使她和萧军生活在一起时，也同样一无所有。《南市街》有多篇文章写到贫穷、饥饿与寒冷。萧红称萧军是“一条受冻受饿的犬”，其实她也一样，只是一条在外面奔跑，找职业；一条在家里忙碌，煮饭或擦地板而已。两个人都曾经借过钱，典当过；借钱总是很少，三角，五角，借到一元是很稀有的事。萧军在大风雪天出外是没有皮帽的，他借来的夹外衣，常常两个人穿，

等他从外面回来，萧红就披起来忙活。在屋里，只要火炉生着火，萧红就站在炉旁；更冷的时候，甚至坐到铁炉板上去把自己煎一煎，如果没有了生火的木柈，她就披着被子坐在床上，日夜不离。有时，她把两只脚伸进炉膛里去，两腿伸得笔直，就这样对着炉门，一面取暖一面看书。萧军进门看见，还取笑说她是在“烤火腿”。

大雪总是给萧红带来不安和恐怖。半夜里，她冻得全身冰凉，即使睡去，也尽做着冻死冻僵的噩梦。她这样描述冬雪对她的侵袭：“我的衣襟被风拍着作响，我冷了，我孤孤独独地好像站在无人的山顶。每家楼顶的白霜，一刻不是银片了，而是些雪花、冰花，或是什么更严寒的东西在吸我，像全身浴在冰水里一般。”

饥饿和寒冷紧紧迫逮着萧红。她常常连黑面包也吃不起。因为没有钱，早上卖面包的人提着挤满面包的大篮子到过道里卖，她始终没敢推开门。她在书里写道：“门外有别人在买，即使不开门，我也好像嗅到了麦香。对面包，我害怕起来，不是我想吃面包，怕是面包要吞了我。”她买面包欠了钱，第二天萧军起来再去买，卖面包的人立刻从他的手上把面包夺了回去。她写道：“我充满口涎的舌头向嘴唇舐了几下，不但‘列巴圈’（面包）没有吃到，把所有的铜板又都带走了。”

萧红有一篇题作《饿》的文章，其中有了面包，她决心做偷儿的一段：

……黎明还没到来，可是“列巴圈”已经挂上别人家的门了！有的牛奶瓶也规规矩矩地等在别人的房间外。只要一醒来，就可以随便吃喝。但，这都只限于别人，是别人的事，与自己无关。

……过道越静越引诱我，我的那种想法越想越充胀我：去拿吧！正是时候，即使是偷，那就偷吧！

轻轻扭动钥匙，门一点响动也没有。探头看了看，“列巴圈”对门就挂着，东隔壁也挂着，西隔壁也挂着。天快亮了！牛奶瓶的乳白色看得真真切切，“列巴圈”比每天也大了些。结果什么也没有去拿，我心里发烧，耳朵也热了一阵，立刻想到这是“偷”。儿时的记忆再现出来，偷梨吃的孩子最差

耻。……我抱紧胸膛,把头也挂到胸口,向我自己心说:我饿呀!不是“偷”呀!

第二次也打开门,这次我决心了!偷就偷,虽然是几个“列巴圈”,我也偷,为着我饿,为着他饿。

……在“偷”这一刻,郎华也是我的敌人;假如我有母亲,母亲也是敌人……

贫困的日子,阴暗的居室,恶劣的环境,永久的焦虑,完全毁坏了萧红的健康。头痛、咳嗽、肚痛、失眠、疲乏……在她此后一生中,这些肺病、胃病、贫血、神经系统的诸多症状从来未曾消失过。可是,除了临终前的一次住院,她没有做过检查,她看不起医生。在哈尔滨,她听说有一家医院可以免费看病,老远跑了过去。这家医院看病草率不用说,取药也仍然要收费的,她没有钱,当然只好无功而返。

萧红当时的生活境况,实际上比一般的城市贫民还要差。所以,她向聂绀弩说起文学时,会说在她的小说中叙说的众多“奴隶”,地位比她高,处境比她好;她不配悲悯他们,而应该是他们悲悯她。

双重视角:穷人与女性

这样,萧红的文化身份自然生成了两个视角:一个是女性,一个是穷人。这两个视角是本体的,又是重叠的。

作为知识女性,萧红虽然不如西方的女性主义者那么激烈,直接诉诸于政治行动,但是,在要求男女平等,反对象对妇女的歧视、压迫和侮辱,争取妇女的独立自由、自主权利这些方面,她的态度是明确的,立场是始终如一的。她没有以传统的伦理观念要求男女的和谐,两性间的一致性在她看来,只能由“男性中心社会”的瓦解、男性对女性个体的尊重所达致。所以她认同并赞美妇女对男性的反抗,而把女性对男性的依附和顺从引为耻辱。但是,萧红看到,在中国社会底层,在农夫农妇中间,他们存在着一个更为基本的急迫的问题,就是生存的权利。在这里,生存高于一切。至少,

性别问题是同人性、人权问题结合在一起的。萧红曾经表示过，男性和女性差异不大，也只是在生存这一层面意义上来说的。就是说，她在女性的视域中，多出了一个穷人的视角。这正是萧红作为一个直面人生的现实主义者，不同于一般的理念上的女性主义者的地方。

在《商市街》里，萧红就保留了这两个视角。她嘲讽富人和上流社会，对穷人寄予同情；对于萧军在男女问题上所持的轻浮态度，她同样毫无保留地给予批评、揶揄，甚至表示不屑，自然也流露着受伤之后的感慨与苦痛。什么叫“底层文学”？无论是作为穷人还是作为女性，萧红都是一个身陷于底层的人，以这样的社会身份，以及忠实于这一身份的感受写出来的文学，哪怕是足够“自我表现”的文学，也都是底层文学。

从写作第一个小说《王阿嫂的死》开始，萧红就把她的文学，献给了“永远被人间遗弃的人们”，其实也就是穷人和妇女这两部分人。在她的小说中，这两部分人往往结合为一种角色，她不倦重复地叙说着这样一种角色，即穷苦的女性。从小姑娘、小学生到老妇人，从产妇、母亲到寡妇，她以深浓的颜色描绘她们的命运，含着热泪，感叹她们的善良、诚实和不可救药的柔弱；其中虽然也有反抗的分子，但是在她的笔下是为数极少的。她着重揭示的是她们的不幸、痛苦和不平，是整个社会的不公。

在《生死场》中，萧红写道：“在乡村，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，忙着死。”小说中带着自己的姓名出现的妇女，大多是被折磨以后悲惨死去的。而许多妇女连姓名也没有，她们“仿佛是在父权下的孩子一般怕着她的男人”。其中写到，月英得了瘫病以后，便遭到男人的打骂，下体生了蛆虫也没人管，严寒天气夺走她裹身的被子，用砌起来的砖块代替。《呼兰河传》第五章写小团圆媳妇在十二岁那年嫁过门去，婆婆就开始打她，甚至吊打，院子里天天有哭声。然后，是接连的跳神，看香，赶鬼，吃偏方，野药，扶乩，一直到小团圆媳妇发烧害病不能起来。最后，用开水给她洗澡，是最为触目惊心、惨无人道的一幕！一个晚上就用开水烫了三次，烫一次，昏一次，一个天真活泼的小女孩——小媳妇就这样死掉了！

众多穷苦女性的受难与惨死,在萧红笔下,更多的不是来自直接的政治压迫,而是来自她们的丈夫、婆婆、尊长、亲属、同学,周围的人,来自家庭和社会的歧视、侮辱和迫害,来自文化压迫。正如在鲁迅的《狂人日记》里出现的,这是一张“吃人”的网;但是,萧红并不作抽象的描述,而是把不幸和死亡连结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上。每一处都透出人类的愚昧。萧红说过,文学就是跟人类的愚昧做斗争。

穷人和女性作为外视角,落在作品的题材、人物和故事上面;而作为内视角,则表现为作者的道德立场、思想和情感的倾向性。卡夫卡说:“当我们生活的世界陷入不义时,惟有受难才能让我们与这个世界产生积极的联系。”可以看到,萧红完全自觉地站在受难的穷人和妇女一边,暴露权势者,反抗“男权中心社会”,控告世界的的不义。但是,当她批判穷人和妇女的愚昧和残酷时,那充满愤怒的目光中,却又是含了哀悯的。她清楚地知道,使穷人和妇女的人性劣质化的根本原因是什么。在立场上,她做了必要的倾斜。

在《生死场》中,“受罪的女人”被置于中心的位置。除了瘫痪死去的月英以外,金枝也是出场较多的一个。她只是男人泄欲的工具,嫁不到九个月,就和别的村妇一样,“渐渐会诅咒丈夫,渐渐感到男人是炎凉的人类”。全村起事抗日时,赵三宣誓道:“我是中国人!我要中国旗子。我不当亡国奴,生是中国人,死是中国鬼……”金枝说的却是:“从前恨男人,现在恨小日本。”但接着补充说:“我恨中国人呢!除非我什么也不恨。”

《呼兰河传》有这样一段讽刺性的议论:

“这都是你的命,你好好地耐着吧!”

年轻的女子,莫名其妙的,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有这样的命,于是往往演出悲剧来,跳井的跳井,上吊的上吊。

古语说:“女子上不了战场。”

其实不对的,这井多么深,平白地你问一个男子,问他这井敢跳不敢跳,怕他也不敢的。而一个年轻的女子竟敢了,上战场不一定死,也许回来闹个一官半职的。可是跳井就很难不死,一跳就多半跳死了。

那么节妇坊上为什么没写着赞美女子跳井跳得勇敢的赞词？那是修节妇坊的人故意给删去的。因为修节妇坊，多半是男人。他家里也有一个女人。他怕是写上了，将来他打女人的时候，他的女人也去跳井。女人也跳下井，留下来一大群孩子可怎么办？于是一律不写……

《马伯乐》可以说是《阿Q正传》的抗战版。鲁迅说他写阿Q，是在画中国的寂寞的魂灵；萧红则是以“逃”的意识集中了国民的劣根性，摹拟鲁迅在小说中的悲剧喜剧化的手法，继续描写中国的魂灵。小说选取中产阶级家庭的寄生的男人为主角应当不是偶然的。其实，从萧红看来，国家、权力、战争、政治、秩序、规则，所有的霸权话语，都是男人的集合、扩张或延长，因此，不可避免地同样遭到她的质疑和批判。

叶紫的《星》及其他小说，一样的乡土题材，明显缺少女性视角。像柔石的《为奴隶的母亲》，也不是从女性视角出发的，虽然主角是女性，包含的却是男性的同情。丁玲是一个女性主义者，写出《莎菲女士的日记》，但是，在写作《水》以后，她的作品开始向阶级斗争倾斜。即使到了延安，她在《在医院中》《我在霞村的时候》等作品中一度发出质询，经过批判，很快就宣布向集体做无条件的皈依了。

萧红在初尝创作时，曾经接受过左翼政治的影响，但在其一生的写作中，基本上弃除了意识形态的规训，而坚持个人的自由写作。在她那里，穷人与女性的双重视角，充满着人本主义色彩，与当时建基于阶级斗争理论的中国左翼文学是很不同的。

还可以比较一下在文学史上被认为一贯偏右的作家，如废名、沈从文，都是以表现乡土著名的。废名是周作人的学生，习惯“用毛笔书写英文”；他的小说，在技术层面上，极力做出“现代性”与“传统性”的整合。封建宗法社会的中国农村在他的笔下不曾出现压迫、苦难与挣扎，他写的是现代的“世外桃源”，恬淡、清简、空灵，周作人称之为“梦想的幻景的写相”。沈从文在一些作品中虽然也写及农村的苦痛，但是，由于在认识上他一直以原始的、野蛮的、强悍的力量为美，对民俗中的决斗、杀人等残酷的血腥的行为不但不

加谴责,反而加以赞美,这种力比多崇拜的倾向,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作为一个作家的道德判断和道义力量。此外,他和废名同样喜欢制作牧歌情调,说到底,它源自东方的一种文人情结。

萧红没有这种文人气,她直接介入中国农村的黑暗现实,没有距离,没有创作家的所谓“美学观照”,她把自己也烧在那里面。

即便是女作家,在写作中也未必一定用女性视角观察和处理生活。女性视角的运用,需要具备自觉的女性意识或女权意识。比如张爱玲,虽然在她的小说中,也有不少女主角,但是在叙述的时候,她是冷静地旁观着的,使用的是“第三只眼”。五四时的淦女士、卢隐,都是持女性视角的,但也跟许多知识分子作家一样,缺少穷人的视角。像萧红这样兼具了穷人与女性视角的“复眼”者,在中国现代作家中,恐怕是惟一的。

作家无论左翼或右翼,无论男性或女性,萧红都可以独立其中,超越其上。从家庭到社会,作为受难者和牺牲者的角色,成了她的一种深厚的、无可替代的写作资源。她以天然的“复眼”,摄取并展示了一个广阔而丰富的文学世界。

诗性悲剧:自由的风格

英国作家,女性主义者伍尔芙说:女性的风格是自由的风格。拿这句话来概括萧红的写作,是最恰当不过的了。

萧红的自由的风格,表现在她对社会和人生悲剧的诗性书写上。悲剧紧贴着她的肉身,正如她对朋友说的,她一生走的是败路。社会的衰败和个人的挫败困扰着她,而又促她清醒;无量数人的苦难和死亡,不断地震撼着她,召唤她写作。所以,她的大小作品,始终保持着饱满的“原始激情”。萧红的这份激情,无疑地同她敏锐的感觉有关,其中突出的是痛觉。正是持续的疼痛,使她的情绪和情感,带上了一种苦难质性,故而在颜色、比重、速度、形态方面有了异常的改变。她把所有这些主观的东西,在自由叙述中重新植入被创造的世界,从而深化了她的悲剧主题。